

东汉简牍中的社会风貌

杨小亮

1996年至2011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相继出土了六批竹木简牍。1996年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和1997年的九如斋东汉简是最早的,2003年前后又出土了走马楼西汉简和东牌楼东汉简。2010年的五一广场东汉简和2011年的尚德街东汉简更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长沙五一广场,自古以来就是长沙城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崛起,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建造城邑,并初具规模。秦初,在此设长沙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公元前202年,西汉在此建立长沙国,在今五一广场区域筑造扩建长沙城。《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辖临湘、益阳、湘南等十三县,临湘为都城所在,官署位置仍在五一广场区域。可以说,长沙建城2000余年,城市位置未发生迁移,官署位置从未改变。如今发现成批量的简牍合情合理。

丰富了简牍的遗存类型

东汉时期的简牍之前一直相对较少。除西北屯戍汉简和其他地方散见的少量有东汉初期纪年,或根据用语及书体风格推测为东汉以后的简牍外,极少有东汉中期以后之物。因此,五一广场地区连续出土的东汉中期、晚期的简牍,就显得弥足珍贵。

这些简牍埋藏环境基本相同,均来自于古井(窖),从而丰富了出土简牍的遗存类型——井窖简。它与遗址简、墓葬简三足鼎立,并且呈“井陘”之势,在数量上后来居上。据统计,目前国内出土的井窖简约有16万枚左右(含残简),占简牍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古井与古代衙署相关,因而在内容上,井窖简也多以行政、司法等官府文书为主,与墓葬简中多见的更引人注目的“典籍”竹书截然不同。正是这些实用性的、内容各有偏重的官府文书类简牍分批次的出现,让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在过去20年中,这些简牍的整理、研究、出版也引领着秦汉、三国、两晋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2010年考古发掘的五一广场东汉简(以下简称五一简)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它的时代相对清晰,基本为东汉中期和帝(公元88年)至安帝(公元125年)时期。它的数量更多达6862枚,是迄今为止出土东汉简牍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占到东汉简牍总数的3/4以上。这批简因为时代相接、性质相同、内容关联性强,鲜活反映了公元100年前后长沙郡临湘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从走马楼西汉简到三国吴简的“湖南简牍文书群”序列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汉中期简牍的重要例证。

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俗

五一简多为长沙郡临湘县廷处理各种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文书。有长沙郡太守府直接下达或转发的下行文书,也有郡内县与县之间往来的平行文书,还有临湘县上报太守府的文书底本,因此比其他东汉时期的史料类型更全面,记述也更为详实和生动。通过全方位的研究,我们可以复原东汉中期临

湘社会的多个侧面,发现很多历史细节。

比如每逢旱涝灾害之时,朝廷便会颁布一些诏书或法令,以保护粮食生产和供给。五一简中保留了两份诏书的摘抄本,一份为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一份为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内容大同小异,前者言“甲戌诏书: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立秋如故。去年雨水过多,谷伤民饥,当案验查召,轻微耗扰,妨夺民时。其复假期,须收秋,毋为烦苛。”大意即告诫,约束主狱官吏,除死刑外,断狱不能妨碍农作时令,目的在于保护劳动力以增加生产。

从一些简中又可知,在向国家缴纳纳税的时间内,当地也会在一些平时不易监管的交通要道设置临时治安岗亭,以保障运输。为了禁绝粮食浪费,也有禁止民间私酿、私沽、群饮的相关规定。五一简中多见有对“糜(靡)谷作酒”之吏民的处罚,违反者“罚金二两”。

东汉中后期,流民问题相当严重,从五一简中可知,当时的流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客籍或原籍占著户口,即“随人在所占”。这也是安抚流民,增加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五一简还可以和之前的走马楼西汉简、之后的走马楼三国吴简进行纵向比较,看出这一制度的演变脉络。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

简牍形制是简牍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五一简中保存有楸、檄、封检等多种完好的实物形态,包含了简牍文书的丰富类型,既可视作相关简牍形制的标本,也启发了我们的认知。

比如富有特色的“合檄”。檄这种文书因为不同的封城方式和用途分为合檄、板檄等。合檄是上下两片相合之檄,居延汉简中未见合檄实物,学界曾推测,合檄必然是把文件写在大小相等的两片木板上,然后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起来,再缠上绳子,印上封泥。五一简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上文字自署为“合檄”,从而证实了合檄实际是将小的木板“镶嵌”在大的有凹槽的木板之上,然后再施以封泥。

还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简牍。比如“君教”木牍。这是一种较宽大的木牍,分三栏书写,上栏写“君教”,并有类似于花体的画押文字“诺”,下二栏为“白事文书”,即直接上报长官无需转呈的文书,“诺”为长官同意后所作的批示。这种木牍实物在东汉以前的简牍中并未见到,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则多次出现。还有“本事”签牌。这种签牌只见于东牌楼东汉简、五一简及三国吴简和楼兰晋简,可证东牌楼简中类似内容签牌中的“本”字,就是“本事”的省写。而五一简中“本事在此中”的表述,正可与《史记》《汉书》中“事在某篇”“事在某传”等记录方式相参照,这应该是“史家写作”和“日常写作”相互渗透的结果。同时,“君教”木牍及“本事”类签牌只见于东汉及以后的官方文件中,似乎说明,东汉时期的文书样式更趋于成熟和程序化,其面貌有一定的革新,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考古工作者还第一次发现了“像人”木俑。以往所见木俑多见于墓葬,而此“像人”

木俑却与司法程序相关。该木俑“呈站立状”“整木雕成”。五官仅雕出轮廓,分腿站立。保护人员在对木俑进行脱水保护时,发现俑人身上多个部位有墨书的字,比如左耳后写有“创一所”三字。研究者认为木俑和爱书一起上报是当时公堂审案的一种方式。在木俑身上标明各处创伤的位置,便于公堂之上主官查验断案。

虽然多为废弃的简牍,但与其他东汉简牍“散乱”的特点不同,五一简是可以编联的,因而更具系统性。尤其是木两行简,出土时保存状况较好,从所存的标题简和册书的首简、尾简及可关联的简文观察,大约存有100余份册书的基本框架和部分内容。有的竹筒残断严重,但也是可以编联的,通过开展更多的缀合、编联工作,即可恢复出其原本为册书时的大概样貌。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目前五一简的整理和资料刊布工作已将近过半,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册书复原语境下综合研究的持续展开,必然推进东汉社会的官僚管理体系、司法程序、文书制度、名物训诂和语言文字等研究,从而使略显零散的简牍摆脱“碎片化”的困境,发挥出其蕴藏的重要价值。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图①:长沙郡太守发往临湘县廷的下行文,形制为合檄(部分)。

图②:五一简中的保任文书。

图③:申请设置“例亭”文书的正面。

图④:申请设置“例亭”文书的背面。

图⑤:“本事”签牌的正面。签牌上端的圆孔用以穿绳,可系于成卷的册书之上。其上所有文字用以显示卷宗的主要内容。

图⑥:“本事”签牌的背面。

图片均由杨小亮提供
版式设计:蔡华伟



走进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王真胜

古朴典雅的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矗立于北京长辛店花园南里甲15号,1987年2月7日对外开放。纪念馆为老北京四合院布局,中式门楼顶部和房檐处,以金黄色琉璃瓦装饰,古香明柱,水刷石镶衬,配以清水砖墙,苍松翠柏中浑然大气。在许多人心目中,这里保存着中国工人斗争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辛店工人运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同时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邓中夏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翌年,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和北京、天津、保定的工人代表,在长辛店宣布成立“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工人俱乐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月刊热情称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在北京永定河西,卢沟桥畔,千古镇镇长辛店,如今是见证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标志性遗产。沿长辛店老街步行,一个个承载历史记忆的名字映入眼帘: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二七惨案长辛店发生地……长辛店二七纪念馆更是我们走进那段历史的窗口。

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前门西站,南至汉口玉带门车站,全长1214.5公里,由清政府向比利时贷款、比利时承建。1897年京汉铁路卢保(卢沟桥至保定)段最先开工,在卢沟桥西设立小型车辆修理厂——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两年后毁于义和团运动,1901年在卢沟桥东三合庄复建,改称长辛店机车厂。1905年郑州黄河大桥工程完工,京汉铁路全线贯通,立铁碑以志。铁碑上半部铸有双龙飞舞图案,中间铸有建造者、通车时间及参加落成典礼人员姓名,下半部用法文书写。铁碑与模具承载着中国人筑路强国悲壮史,是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镇馆之宝。这里还陈列着劳动补习学校的油印机、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的火车汽笛等文物,生动讲述着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工会组织、争自由争人权的峥嵘岁月。

1918年春,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创建北京大学附设高等法文专修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9月,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开学,来自湖南、河北、山西的100多名学生在这里半工半读。1919年5月4日,天还没亮,留法预备班、车务见习所及艺员养成所部分学生,骑着雇来的毛驴匆匆赶往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学生一起游行示威。5月6日,工人举行集会,每十个人一起,组成一个个救国十人团,到车间、车站、郊区,宣传爱国,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之后,长辛店机车厂工人史文彬、陈励懋、陶善琮等创办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预备班学生每周两次给工人补习文化,讨论时事。后夜班通俗学校迁到娘娘宫北配殿(现长辛店第一小学内),成为长辛店工人运动主要场所。

1921年1月11日,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坐东朝西小三合院内,劳动补习学校正式上课。正房摆着3列、8排木课桌,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劳工神圣”4个大字,刚下班的工人三三两两走进教室。补习学校教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专职有李实、张纯、贾祝年等,兼职有李大钊、邓中夏、吴容沅、卜世润等人。他们根据工人需要自编教材,讲通俗易懂白话文及工人听得懂的北方话。邓中夏本名“邓仲瀚”,为好写好认,改为“邓中夏”。长衫先生与短衣工人推心置腹,一批批工人党员迅速成长起来。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指挥部。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珍藏着一枚铸造于1921年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徽章。铜质材料,珐琅彩工艺,主体为钴蓝色,中间的图案是白色的带有双翅的火车轮子,是当时中国铁路的标志。轮子后面是一把锤子与一把斧头相交叉,代表着工人力量。从背面的编号“NO.2195”看,徽章铸造了很多枚。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邓中夏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名义提出《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中华全国总工会3年后正式成立。

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京汉铁路局提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等8项要求,未得到答复。8月24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娘娘宫举行罢工。郑州、江岸工会和京绥、京奉、正太等各路人纷纷声援。长辛店1000多人乘列车开到前门西站谈判,京汉铁路局最终答应了工人所有要求。工人们在复工后召开武汉的第一辆火车头上,挂上一面“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大红旗,一路飘扬到汉口。罢工风潮在长辛店这个“风暴眼”骤然升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呼啸而来。

长辛店大街东部火神庙,原为长辛店警察所驻地。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3万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举行全路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2月7日,为营救被反动警察逮捕的工友,工人们聚集火神庙,葛树贵、杨诗田、辛克红等工人当场受伤。珍藏于二七纪念馆的《京汉工人流血记》,是最早报道这次斗争的文献。

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人运动,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山,这是庙底沟彩陶走过的广大区域。海岱地区与庙底沟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彩陶上出现了花瓣纹、旋纹,明显来自庙底沟。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崧泽文化以及西南的横断山区、成都平原,出土彩陶上均可见花瓣纹。河套地区不仅有庙底沟典型的小口尖底瓶,彩陶上也有庙底沟典型的花瓣纹和几何纹……

这不仅仅是一些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艺术思维与实践的趋同,背后则是更深刻的文化认同。有专家认为,庙底沟彩陶“掀起了中国史前时代的第一次艺术浪潮”,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不仅如此,庙底沟彩陶还是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上的绚丽风景。考古学家李济曾提出,在丝绸之路之前,已存在一条“彩陶之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扩散,西方的小麦、羊、马、车以及青铜和铁器冶炼技术等,也顺着这条通道传播过来。展览中特别呈现了黑海一带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彩陶的多张图片,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与庙底沟彩陶、甘肃马家窑彩陶有高度相似性,引人遐思。

百卉含英,开遍大半个中国,也与同一时期相隔万里的文明遥相呼应。图为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彩陶墙(复制品)。

周飞亚摄

庙底沟彩陶的“浪漫旅程”

周飞亚

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之际,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开馆了。

庙底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里程碑。1956年,考古学家安志敏率队到河南陕县开展调查,首次发现了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因之而得名。《庙底沟与三里桥》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诞生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的典型代表,也是仰韶文化的成熟阶段。这时,农业生产已经较为成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出现并形成了区域中心聚落,彩陶技艺也得到较大发展。

“花开中国”——从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充满诗意的名字,不难看出庙底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对于庙底沟文化,“花”是一个很特殊的意象。花瓣纹是庙底沟彩陶上的典型纹饰。古汉语里“花”“华”同音,“华”的本义为“花”,金文中的“华”字就是花朵加上花蒂的样子,有学者指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或许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提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瓣花朵”格局,这一格局即形成于庙底沟时代,作为庙底沟文化中心区域的豫晋陕交界一带,就是“花心”。

展览通过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成果,讲述了庙底沟文化的来龙去脉、文化面貌及其重要影响。其中尤以彩陶的展出和阐释



最为丰富详实。

庙底沟彩陶注重颜色和纹饰的对比、图案的对称和均衡,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彩陶是在坯体上先绘再烧,颜料需要耐高温,因此选材较少,一般只有黑、红、褐(黄)、白几种。纹饰以点、线、面为基本元素,通过连续、反复、对称、共用等构图方式,组合成多种母题纹样。其中两种最为常见,一是以圆点、弧线三角形为元素组合成的花卉纹,也被称为“旋纹”,二是花瓣纹。此外还有象生万物的鸟纹、鱼纹、蛙纹、人面纹以

及抽象的平行线、网格等。

彩陶纹饰流畅的线条和露出的笔锋,说明彩绘用的是类似“毛笔”的工具。有的纹饰是以图案间的留白来体现的,即“阴纹”或“地纹”,从阴与阳的角度审视,纹饰呈现不同的艺术效果。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理念,当时已有体现。写实与抽象的意向表达,阴纹与阳纹的相互衬托,平视与俯瞰的视觉效果,体现出先民成熟的绘画技巧和审美情趣。

东到海岱,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

